

泰西君子熊三拔

徐作生*

熊三拔，意大利傳教士，1606年來華，在京協助利瑪竇工作。熊三拔在中國生活十五年，撰寫了五部科學專著，均被收錄於《四庫全書》。其最著名的成書於1612年的《泰西水法》對我國古代農業發展作出了貢獻。1617年熊三拔等人受權奸迫害被押解至澳門。儘管遭遇惡運，熊三拔仍在逆境之中寫完了《藥露說》，向中國人民傳播西藥學。徐光啟撰文稱贊：“泰西諸君子，以茂德上才，利賓於國。其實心，實行，實學，誠信於士大夫也。余嘗謂其教必可以補儒易佛，而其緒餘更有一種格物窮理之學。”意大利駐滬總領館文化處處長倪波路先生，向筆者披露了他的祖先熊三拔鮮為人知的故事。

倪波路簡歷：明萬曆年間意大利來華會士熊三拔後裔，1955年10月28日生於意大利；1979年畢業於羅馬國立大學政治學系；1980年7月起任羅馬大學教授；1985年調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專案官員；2003年10月起任意大利外交部科教文總理事；2006年起至今任意大利駐滬領事館文化處處長。

老祖宗入錄《中國熊姓網》

人的一生，無論他是在地球的哪一角，注定要遇到一些好友，而這些好友出現在你的生命旅程上，又彷彿是上天在事先就已經給你安排好的，這便是人們常常說起的“善緣”。



倪波路參贊向作者敘述先祖遺事

*徐作生，上海《文匯報》記者、編輯，上海海事大學鄭和研究中心教授，上海交通世界遺產學研究中心理事，中國社科院中外關係史學會會員。

四百年前的今天，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意大利農業水利專家熊三拔以傳教士的身份來華，不久便在他的同鄉、京都聞人利瑪竇的引薦之下，在北京與當時的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啟相識。

而意大利駐滬總領館文化處處長倪波路先生便是熊三拔的後裔。

我和倪波路先生（Paolo Sabbatini）的相識，因緣起於上海市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陳一心先生的牽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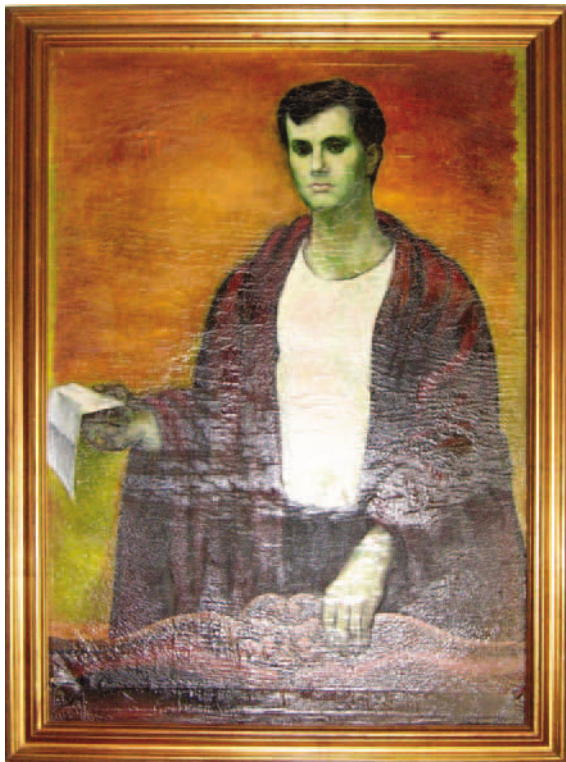
而我更覺得，這彷彿是一種冥冥之中所結下的善緣。巧合的是，今年3月的一天，我第一次應邀去倪波路先生家中作客，隨我同行的翻譯熊小姐，竟然也是由這種緣分促成。

倪波路的家位於靜安寺附近，出地鐵二號線江蘇路站下車，出站約二百米就到。我捺響了門鈴，不一會門開了，一位操着英語的男傭將我們引領入屋，“徐先生請坐，Paolo Sabbatini先生馬上就來。” Paolo Sabbatini是倪波路的意大利名。

乘着空閒的當兒，我環顧屋內的裝飾，這是一幢三層舊式別墅，其裝潢完全按照意大利式樣：底層的頂面是木柵格鋪就的，地面覆以多稜形絳紅色地毯，靠牆的左邊是一架打開着的白色古鋼琴，右邊是一排淡黃色的暖色調沙發，壁上掛着意大利自然風景油畫。在這典型的異國風情的文化氛圍中，有一樣擺設令我感到驚奇，或者是主人的構思巧妙，那就是後壁邊上有一個連體的中國式屏風，正是這個不同一般的擺設，襯托出了整幢房屋的一種中西合璧的和諧感。

正當我沉浸在藝術的紛圍之中，樓梯上傳來腳步聲，抬眼望，一位身着西服、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用中文含笑地朝我說道：“你好！”這聲招呼使我感到異常地親切。——不用問，他就是倪波路先生了。

這位中等身材、戴着眼鏡的意大利領事官員，有一副儒雅而謙恭的儀表，一見面就向我遞上了他的名片。名片上，除了標明他在領事館的職務之外，還有一個令我頗感興趣的頭銜：上海戲曲學院特別顧問。



倪波路自畫像

當翻譯熊小姐將我們各自的姓氏報出之後，倪波路先生驚奇地睜大了眼睛，伸展雙臂，他一左一右地握住我們的手，連連地感歎道：“您的徐氏（指徐光啟）和我的祖先熊氏，早在明朝就是好朋友了；而今天，你的翻譯小姐竟也是熊氏，我們都是一家。太巧了，真是太巧了！世上有這麼巧合的事麼？”一席話語，逗得我們都捧腹大笑。雖然我與徐光啟並非同一宗族，但我還是默認了這個善意的“冒牌貨色”。

我們在底樓的會客廳入座。倪波路首先說，他有一個兒子，三個月大的時候就來到中國，現在已經二十二歲了，會說一口標準的中國話。說起家庭，倪波路告訴我，和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家庭關係、注重孝道一樣，意大利也是個非常重視家庭生活的國度，意大利人總是把媽媽掛在嘴邊。

我看過古代西方傳教士的一些歷史資料，根據教規，這些傳教士是不能結婚的，那麼利瑪竇和熊三拔為甚麼都有後裔呢？看出我的疑惑，倪波路先



倪波路參贊在上海家裡的門楣上安裝了族徽

生回答道，利瑪竇和熊三拔都沒有直系後代，現在他們的後裔都是叔伯堂親，譬如熊三拔的後代均是 Sabbatini（音譯讀作三拔蒂尼，或薩巴蒂尼，本文下面會詳述）家族的後裔。

我又告訴他說，在《中國熊姓網》，把熊三拔及其後裔倪波路也收錄其中；也就是說，中國的老百姓把熊三拔及其後裔都當成自家人了。這位意大利文化官員揚起眉毛，欣喜地說：“是嗎？呵呵，老祖宗名字入了《中國熊姓網》，我太高興了！”

與徐光啟結下善緣

關於利瑪竇之死，倪波路先生語調深沉地說：“他最後是死在我的祖先熊三拔的懷抱裡。”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明朝萬曆三十八年（1610）五月十一日這天，在北京阜城門附近的耶穌會士府邸，五十八歲的利瑪竇感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於是把他的同鄉兼好友熊三拔叫到床前，對他囑咐了最後的遺言：“我利瑪竇遠離意大利故鄉，跋涉萬里路途，來到中華，並獲得大明皇朝的俯允，直接到紫禁城跪拜過龍椅，雖死而無憾矣！”說到此，他劇烈地咳嗽了一陣之後，又气喘吁吁地接着說道：“我死後，希望你不要停止科學研究的步伐，把我本人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等書繼續完成，以帶給中國人新的思維方式。”熊三拔點點頭，應允了。

繼而，他將利瑪竇的頭靠在自己的臂膀裡，以便讓利瑪竇稍許減輕一點病痛。熊三拔神色異常地悲哀，想到與這位靈魂高潔的老友朝夕相伴，而現在他將永遠地離開他們，熱淚便禁不住順着雙頰流

淌下來。這時候，立在一旁的其他三位年輕的傳教士也不住地用袖口在悄悄地拭淚。呵，多麼悲哀的事，多麼悲哀的事啊！

正在這個時候，太僕寺少卿李之藻博士聞訊匆匆趕來，他隨身還帶了京邸的六名御醫。御醫們對利瑪竇進行了會診之後，開了藥方，又對李之藻叮囑了幾句就走了。他們的意思是，利瑪竇已經病入膏肓，快給他預備後事吧。

李之藻留了下來，他素與利瑪竇交誼深厚，此刻，他俯身在利瑪竇的耳旁，握着他的手，凝望着他骨瘦如柴的臉龐，心裡非常難受。利瑪竇嚙動着雙唇，他似乎想交代甚麼，但是已經無力張口說話了。熊三拔讓利瑪竇在自己的懷裡靠得更近些，他抽泣起來，用斷斷續續的聲音說：“李大人，利公先前曾經囑咐過我和龐公〔即龐迪我，字順陽，西班牙人〕，他生前得睹天子聲光，這是很值得慶倖的事。所以他希望身後自己能葬在京城，盼望皇帝能夠恩准，賜封他塋地。”說到此，熊三拔將奏摺遞給了李之藻。

利瑪竇終於去世了，臨死之前，他指指熊三拔，又指指自己。熊三拔明白利瑪竇的意思，是想請自己在他歸天之際，為他作祈禱。於是，教友們將利瑪竇抬到了教堂的禮拜堂，舉行了彌撒，根據利瑪竇的遺囑，熊三拔噙着淚水，替他唱最後的禱歌。

利瑪竇的死訊傳到了皇宮，萬曆皇帝十分悲痛。根據死者生前的願望，皇帝親自下詔：“以陪臣禮，葬阜城門外二里溝嘉興觀之右。”

先是，利瑪竇病重之時，徐光啟正在遠離京師的上海，他接到消息，星夜趕路北上，然而等到他馬不停蹄地趕到北京的時候，利瑪竇已經下葬，這使得徐光啟極度地哀傷。他在熊三拔的陪侍下，在利瑪竇的墓前徘徊良久，“哀之如師傅”（徐光啟：〈行實〉），哀傷之情，如同失去了自己的恩師。

倪波路先生告訴我，利瑪竇死後，他的幾部幾何著作沒有能夠全部寫完，是熊三拔繼承了利瑪竇的遺志，他和徐光啟一起，最終合作並且完成了這些書稿的撰述和翻譯工作，對於這一點，至今學術界鮮有人知。這些著作，包括熊三拔個人獨自撰述



倪波路先祖中這一位曾被羅馬教皇派往法國

的五部專著，即《泰西水法》、《簡平儀說》、《表度說》、《中國俗禮簡評》和《陸若漢神父著述註解》，它們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部均有收藏。

我對倪波路說，明朝的官員對熊三拔的評價是很高的，他聽後非常高興，喃喃地道：“喔，喔，是這樣的呀！”

據《徐光啟文集》記載，1612年（萬曆四十年），徐光啟從熊三拔編成《泰西水法》，他為這部書所作的序中云：“泰西諸君子，以茂德上才，利賓於國。（……）其實心，實行，實學，誠信於士大夫也。（……）余嘗謂其教必可以補儒易佛，而其緒餘更有一種格物窮理之學。”

這段語言深奧的文言體，倪波路聽後不甚了了，於是我就告訴他：“徐光啟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熊三拔和其他來自西方的諸君子，以他們的高尚的品德和絕世的才學，對我們大明作出了有益的貢獻。熊先生用他誠實的心胸以及自己的實際行動，取得了士大夫階層的認可。我曾經說過，熊先

生所傳授的東西必定能夠補儒、易佛，而這種來自西方的科學，哪怕是點滴之物，也值得我們國人去對其進行深入學習、探究的啊！”

從文中所說的“茂德上才，利賓於國”之語，可知徐光啟是十分敬佩熊三拔的人品和才學的。徐光啟在與熊三拔的交往中，每每碰到一些科學難題要去請教他，而這個時候，熊三拔總是有問必答，徐光啟說：“余嘗留意茲事，二十餘年矣，（……）問以請於熊先生，唯唯者久之，察其心神，殆無吝色也，而顧有忤色。”殆無吝色，意思是幾乎沒有捨不得的神色；顧有忤色，是徐光啟講自己常常打擾人家，而心裡感到慚愧。

三拔蒂尼是意大利一個望族

由於二十多年的外交生涯經歷，倪波路先生通曉法、英、西班牙語及中文和阿拉伯文。他告訴我，中國的日常生活用語他能聽得懂，祇是太深的專業名詞還須翻譯。他說：“我的中文是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唸書時學的，我的老師是一位會說法語的中國人。”

見我對這幢房屋的意大利式佈置和裝潢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倪波路便說，它上下共計有三層，是他向當地房產部門租借的。舊時的房主是一個白俄，大約在上世紀20年代時候逃到上海，房子在50年代初期被收歸國有。

在底樓會客廳，我看到門楣上有一個徽標，那是一個紅、綠相間的標識，於是饒有興趣地問道：“那是甚麼呢？當中還鑲有一隻直立的黑獅。”立在一旁的倪波路先生告訴說：“這就是我們三拔氏家族的族徽，你看那隻直立的黑獅，多麼雄壯有力！”繼而，他又指着族徽道：“你看到了嗎，上面還有拉丁文的箴言。這和中國的世家、書香門第有自己的格言或者祖訓是一個道理。”

在扶梯一側的牆上，掛着由倪波路創作的一幅油畫，油畫中的人物一望而知是個具有貴族身份的人：他有着睿智的目光，上身披着一件灰色的教衣，胸前掛着一隻銅十字架。倪波路說，這是他畫的一幅肖像畫，而畫裡的人物，是他的曾祖三拔蒂

尼·朱里安諾（Sabbatini Giuliano），一個被羅馬教皇派到法國的大使。

我請教他，如果要按照中國姓氏的規律，這“熊”應該是您的先祖的原姓。他點點頭，而後卻向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素仰徐先生研究中外歷史之謎，不知道對動物也有探究之癖麼？譬如說老虎、熊等等。”我抱憾地搖搖頭。祇聽得他又絮絮地說：“熊三拔原來的姓氏是 Sabbatino de Ursis，中文說作三拔蒂尼·烏席斯。這個烏席斯（Ursis），是意大利語，把它翻譯成為中文，就是熊。而 Sabbatini，則是中國古人對三拔的音譯。我的倪波路，也姓 Sabbatini，音譯讀作三拔蒂尼，也就是中國古人簡稱的三拔。我這一支就是與熊三拔同一家族的後裔。”⁽¹⁾聽他如此這般地一番

解釋，我方恍然大悟，為甚麼他會問起我對動物有無探究之癖。

其實，意大利民族一些古老的家族把動物作為姓氏，這與我們中華民族的姓氏起源有着共通之處。我對倪波路先生說：“在中華姓氏中，熊氏起源是原始社會母系氏族時期的動物圖騰，發展到文字以後，它就成為姓氏的標誌，如同姓龍、姓虎、姓牛、姓羊等等一樣。在我們中國，熊是一個古老的姓氏，出自黃帝有熊氏之後，起源於今天的河南新鄭。”

倪波路先生靜靜地注視着我，一言不發，饒有興趣地聽翻譯轉述了我的一番“姓氏考古”，並且不住地頷首，他說：“三拔蒂尼是意大利的一個望族，我很高興古老的中國也有這樣的一個姓氏。”

一幀三拔氏族譜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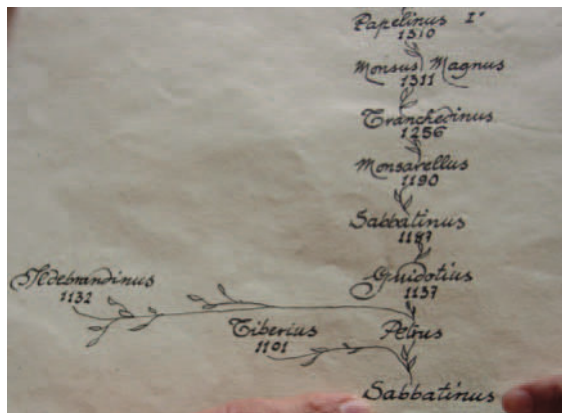
我們一邊興致濃鬱地交談着，一邊品嚐着方几上的點心和咖啡。

繼而，倪波路邀請我到三樓，他說：“徐先生，我請你看一樣東西，你一定會感興趣的。”

這套別墅的二樓作為主人起居的臥室，而三樓則是他的書房兼創作室——倪波路，這位意大利的文化官員，還有一樣非凡的天賦，那就是他的繪畫天才，這套別墅裡的所有的油畫作品，包括意大利古代人物肖像畫、自然風景等，均出諸其手筆，令人對這個洋夫子不得不刮目相看。



熊三拔唯一的遺物



“這是我的一世祖！”倪波路指着族譜說。



倪波路在製作油畫

我們登上三樓，首先吸引人目光的是一個約有二米高的八門大書櫥，粗略一算，藏書三千餘冊，而且大多是一些舊版本的意大利古籍，彌足珍貴，由此也顯示出主人深厚的文化底蘊。

“那麼，你們後裔有沒有祖先遺留下來的家譜？”我問倪波路。他走到朝南的窗口，朝我招手道：“徐先生，你到這邊來，我請你看我們祖先的譜系。”他說着，用鑰匙打開一隻中式的樟木箱，從箱子裡拿出一軸長卷，然後在桌子上把長卷展開，原來，這是一幅〈三拔氏族譜系圖〉！

倪波路先生告訴我，他的這幅〈三拔氏族譜系圖〉，是為了我撰寫這篇報道，而專門繪製的。先是，他從2007年12月，特地返回意大利他的家鄉，走訪了族中的長老，還到當地圖書館查閱了大量的歷史資料，費時六十多天，才完成了這幅三拔蒂尼譜系圖。倪波路說，他有一個思路，就是在考訂和排譜的時候，把上溯時間定於公元1000年。我根據

圖示，很容易地找到了倪波路的一世祖為Sabbatinus。

“有沒有你繪製的熊三拔畫像呢？”我問他道。

“我想在自己的故鄉尋找一張熊三拔的畫像，但是一直沒有覓到。由此使我萌發了一個心願：繪一張熊三拔的畫像。等到我下次再回意大利的時候，在家鄉訪查老一輩人，聽他們所形容的口述，再根據中國古書提供的線索，二者糅合起來，那麼熊三拔的形態就活了。”說到此，他頓了一下，而後又接下去道：“遺憾的是，我的祖先熊三拔，在自己的祖國意大利卻默默無聞，沒有人知道他；而在他的第二故鄉——中國，卻被寫進了歷史。他的成果，不在意大利，而留在中國；他的遺體，沒葬在家鄉，而被葬在北京。中國人民接納了他！”

我又問倪波路先生，有沒有你的祖先熊三拔所遺留的書籍？他點點頭，並拉開書櫥的第三門，在底層拿出一個盒子，然後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

打開盒子，從裡面取出一本深黃色羊皮封面的書，這本書有八百多頁，因為年代久遠，脆薄易碎，翻動每頁的紙張都要非常地謹慎。

“這本書是我的祖先所留下的唯一的遺物，”倪波路用手掌輕輕拂拭着深黃色羊皮封面，“它是用拉丁文寫成的，書名叫《怎樣面對好運和厄運》。書是在意大利威尼斯出版的，付梓時間是公元1515年，也就是明朝正德十年。先祖熊三拔到中國來的時候，離家的那一天，他從父親的手中接過這本書，當時他三十一歲，是明朝萬曆四十年。這本書也就成了我們三拔蒂尼家族的傳家之寶。”

“那麼，這本書主要講述了甚麼呢？”我問道。

“《怎樣面對好運和厄運》是一部哲學著作，它的主旨是告訴我們後裔，一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一定要保持樂觀向上的心態，即使在厄運面前，也要以微笑去面對。這，也就是我的祖先熊三拔要傳達給中國人民的！”講到此，我看到倪波路先生的眼角湧出兩顆晶瑩的淚花，繼而，他從西服的上袋裡掏出手絹悄悄拂拭着。

正如《怎樣面對好運和厄運》所闡述的，熊三拔在中國生活的十五年之中，曾經遭受過坎坷和磨難。

我看過明史上的記載，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禮部侍郎沈淮依靠魏忠賢在背後撐腰，上奏朝廷，參劾教士。次年，熊三拔等人被押解至廣東，遂又遞解至澳門，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南京教案”。儘管遭遇惡運，熊三拔仍然以堅韌的意志，在逆境之中還寫完了《藥露說》，向中國人民傳播西藥學。

我對倪波路先生說：“在乾隆皇帝欽定的《四庫全書》裡，收錄了熊三拔所撰寫的科學專著，其中最著名的有成書於明萬曆四十年（1612）的《泰西水法》，以及《簡平儀說》、《表度說》等。《泰西水法》是一部介紹西方水利科學的重要著作，《四庫全書總目》對此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稱‘是書皆記取水蓄水之法。’”怕他不明白這最後一句話，我又用白話翻譯說，《泰西水法》可以稱是熊三拔的代表作，這部書所記述的全部是關於如何使用機械，把江河之水抽取到農田裡，以達灌溉之利。

熊三拔在另外一部書《簡平儀說》中，闡述中國農曆節氣的科學依據，比如春分、冬至。中國人認為，從春分這天開始，白天的時間一天比一天長；而冬至這一天，就是一年之中，白天最短的一天。

聽罷我的敘述，倪波路激情難抑地回答：“我祖先的這些著作和科學成就不是留在家鄉，而是留在了中國，這就是為甚麼今天意大利一般的老百姓不知道熊三拔，而中國人民卻记住了他。我為自己的祖先而自豪，因為他把他的智慧奉獻給了他的第二故鄉——中國！”

我告訴他，我還在上海圖書館善本古籍部查找到了關於熊三拔的傳記，這頁〈熊三拔傳〉，錄自《增補泰西名人傳》卷四“明朝”，光緒二十九年鴻寶齋石印本，陽湖汪詢書撰。於是，我將這段文言體的〈熊三拔傳〉給倪波路先生譯成白話文，他側耳聆聽，生怕遺漏了其中一個字。而當我把這頁複印件以及一幅中國古籍中的意大利地圖掃描文本送給他時，他欣慰地展開笑顏，從我手中接過這兩樣東西，連連地說：“謝謝！謝謝！這是最珍貴的禮物！”

“三拔家族有兩個遺傳”

“我們三拔蒂尼的家族千餘年來，一直保持着兩個遺傳，”倪波路先生語調充滿自豪感，“這兩個遺傳，一個是文學和繪畫創作，另外一個是機械製造研究。”他說到此，把我領到靠近三樓扶梯口，那裡的牆壁上，掛着一隻大鏡框，鏡框裡鑲嵌着一張獲獎證書，這張證書的紙質已經微微發黃，看得出年代久遠了。

“這是1923年，我的曾祖父在世博會上所獲得的加熱器研究製造一等獎。當時他是意大利最著名的機械工程師。”倪波路微笑地說。

他接下來告訴我，最初的時候，菲亞特公司生產的加熱器還是用手搖柄來發動的，他一邊說着話，一邊用手勢在空中劃着一個又一個的圓圈動作比劃着，“就像這樣地搖着，搖着，很吃力，而且

耗油厲害。1923年，我的曾祖父第一個研製出了汽車引擎，菲亞特公司採用了這種加熱器之後，不但縮小了原先加熱器的體積，而且節省了人力，更重要的是，油比原來要節約一半！這種加熱器，直到今天，還在全世界的汽車心臟裡起搏、發動。”

我聽到這裡，不由地豎起了大拇指，我說：“是的，這就是三拔家族的遺傳，因為在中國的明朝，熊三拔便將他的發明的龍尾車用到了中國的農村。”我把一張龍尾車的圖片遞給倪波路先生，他饒有興趣地看着。

這張龍尾車的圖片，原刊於熊三拔所著的《泰西水法》中。整部的水車，傳動部分有“在圍之輪”、“在軸之輪”、“在樞之輪”等，各種部件均標有尺寸，龍尾車的車身形狀宛如一條水龍伸入農田。龍尾車實際上就是今天的羅旋推進器，這種羅旋推進器在今天各種機械上常有應用，在扳金工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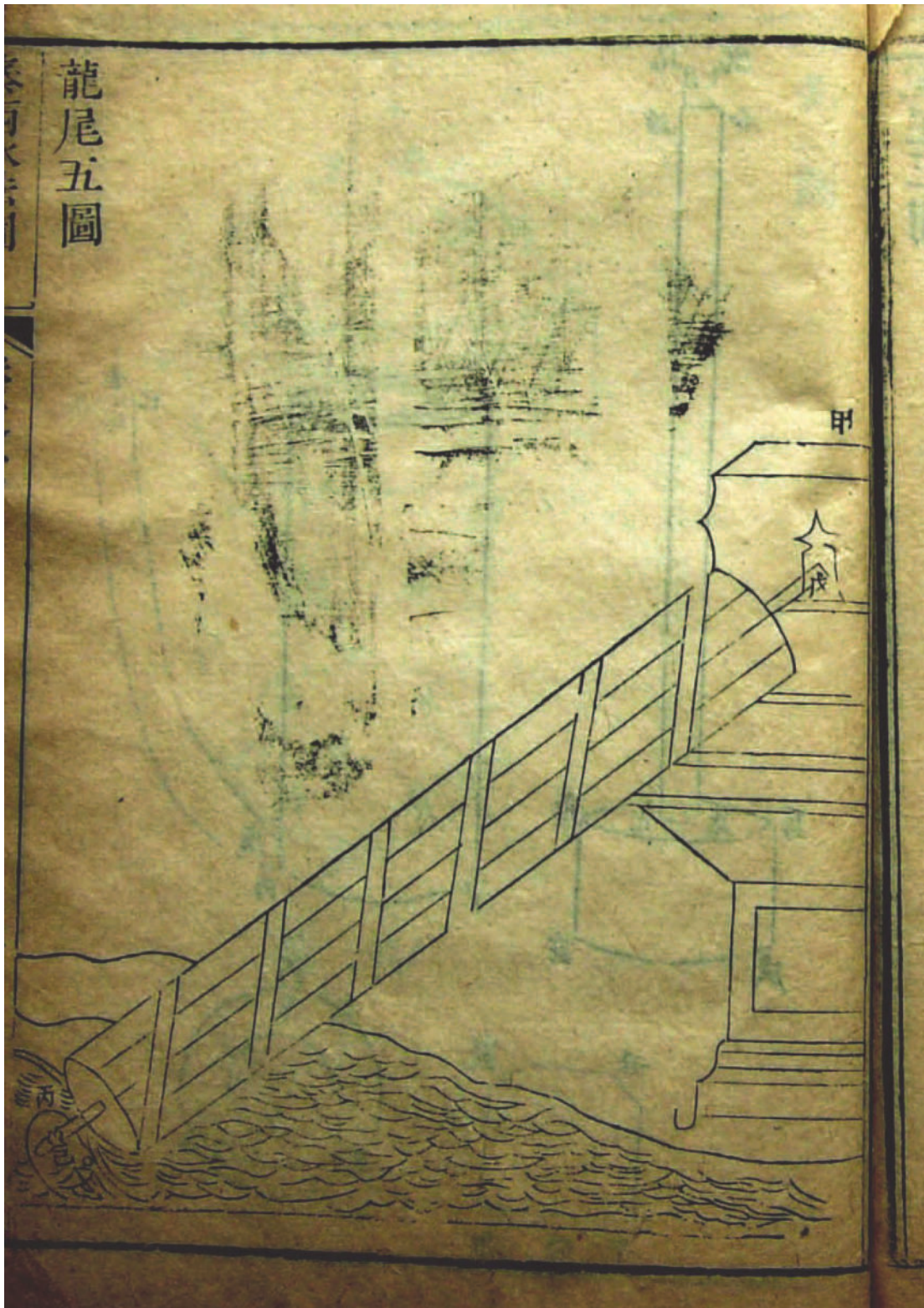
裡製作起來並不困難，但是在近四百年前的萬曆年間，要製作出龍尾車上的所謂“牆”這樣的螺旋面，卻是相當不容易。這可能也是龍尾車沒有得到較大推廣的原因之一吧。

聽我講到此，倪波路關切地問：“那麼，在中國的歷史記載裡，有沒有提及過我的祖先發明的龍尾車呢？”

我點點頭，答：“當然有。據《明齋小識》記載，徐光啟的五世孫徐朝俊，他曾於嘉慶十四年（1809）製成小型龍尾車，兒童即可轉之。松江太守唐陶山聞訊後，認為很值得推廣，於是把這種小型龍尾車請人畫成圖畫，頒佈到松江府各縣。另外，據《梅麓詩鈔》記載，蘇州知府齊彥槐，曾按《泰西水法》裡的敘述，製造並試用過龍尾車和恆昇車。當他在現場試驗時，荊溪的老百姓傾城出動，面積約十畝的草橋塘，祇用了三刻鐘就使塘水降落了七



倪波路的曾祖於1923年獲世博會發明一等獎



熊三拔在《泰西水法》裡手繪的龍尾車局部圖



倪波路講到動情之處眼角湧出淚花

寸。”倪波路聽我講了這些歷史上的真實事情，心中很是感慨。

熊三拔在《泰西水法》裡，講述了如何在乾旱之年，用挈井泉之水，還講了尋泉作井之法，這對當時的封建社會的中國農業經濟發展，無疑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因此從這一點來看，熊三拔的功績是不磨滅的。

一幅珍貴的紀念品

時辰已經不早了，在用畢了茶點之後，我從坐椅上立起身來，與倪波路先生握手告別。這個時候，他打開他的畫箱，從裡面拿出一幅他剛完成的作品贈送給我。

這是一幅長、寬均為20cm的油畫，畫面上，作者通過色彩明暗的變化，將淡紅色的絢麗的朝霞、乳白色的雲彩、絳紫色的仿佛被烈日烤焦的沙漠（……）層層罩染，而這種罩染，顏色盡量單純、明淨，不調和多種複合色，保持顏色的透明度，使畫面乾淨、透亮，並且不顯露筆觸，顏色自然融合，

將描繪對象表現得細膩到位。這種光亮的效果，突出明暗對比，強調光感。

“這是我在新疆、甘肅一路旅行時所產生的一種靈感。我曾經在這條漫長而悠長崎嶇波折的路上行走，這條路一直伸到了天的盡頭。這是一條承載歷史之路，一條承載文明之路，一條通往世界之路，一條記載了輝煌與光榮之路，因之我把這幅作品稱之為絲綢之路。”倪波路先生用他的富有詩意的語言，向我講述了這幅作品的誕生過程：“你看，這條絲綢之路，各種不同的色調，又宛如不同色彩的綢緞，重重疊疊，了無邊際。”

接着，他提筆在油畫的左下角用英文寫道：

“贈於徐作生先生。波洛·三拔蒂尼，2008年3月4日。”

我很感激倪波路先生的慷慨饋贈，感激他把這幅主題深刻、意境美好、表現又如此厚重的油畫作品饋贈於我。

【註】

- (1) Sabbatini的中文意譯，明朝熊三拔之姓氏典出於此，今亦譯作薩巴蒂尼。倪波路先生的意大利姓名我們可讀作波洛·薩巴蒂尼。